

专题研究:文明互鉴与世界中国学

主持语

如何在解释中国的世界学术版图中建立与中国实力和地位相称的话语权,是时下国内学术界关注与热议的话题。为了推进与强化中国表达的全球化,构建“以中国为本位、为主体、为对象”的“中国范式”以取代“西方范式”已然成为学术潮流。然而,“中国范式”的构建并不意味着与外部知识体系的“隔绝”,它需要我们对域外中国研究保有开放、包容、竞争与互鉴的意识,因为众多域外中国研究者基于自身的社会历史语境、文化传统、知识结构、理论基础等而对中国作出的独特诠释与叙事,犹如一面面照摄之镜,在呈现多元的他者视角之同时,更是为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审视与反思的多重镜像,让我们避免迷思于自我之中。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学”的世界化,域外中国研究已成长为巨大的知识存在,而我们对其却“所知有限”。由此,必须“回到学术史”以对海外中国学展开深入的学术考辨!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界即将学术史方法视为开展域外中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但如何运用一直都在探索之中。

李松教授的《学科、学术与话语:海外期刊与中国研究的知识体系构建》,即以刊载海外中国学成果的期刊为关注对象,论述海外中国期刊对于中国研究之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意义及构建的思路方法,认为海外中国研究期刊既是中国研究体系的文献根基,又为中国研究学术体系构建提供对话平台和阐释资源。孟庆波副教授的《略论西方汉学目录研究的意义、材料和方法》,则聚焦于欧美汉学家编纂的汉学出版物及文献作品目录,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挖的论域,别具学术意涵,同时还就西方汉学目录研究的材料和理路方法展开探讨。这两篇文章分别从各自角度就海外中国学研究与“中国范式”构建之关系及如何运用学术史方法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思考与探讨,相信读后一定会有所启发!

(华东师范大学 吴原元教授)

DOI 编码:10.19847/j. ISSN1008-2646.2024.04.001

学科、学术与话语:海外期刊与中国研究的知识体系构建

李 松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近四百年以来,海外创办的近 200 种东方学、汉学与中国学期刊是中国研究的重要学术资源。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应该将世界的中国研究与本土的中国学研究结合起来,在世界与中国互动的大历史中进行文明交流与互鉴。海外中国研究意味着中国学术的世界性

收稿日期:2024-03-06

作者简介:李松(1974—),男,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海外汉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的历史流变及其理论范式构建”(22&ZD258)

本文引文格式:李松.学科、学术与话语:海外期刊与中国研究的知识体系构建[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13.

与现代性,离开“世界中的中国”无法理解“世界中的中国学术”。深入把握海外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观点与思想、方法与路径,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体系具有基础性价值。在全面了解海外中国研究期刊这一学术资源与媒介平台的前提下,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方面论证中国研究的知识体系构建思路与方法。

关键词:海外中国研究期刊;知识体系构建;学科建设;学术建设;区域国别学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24)04-0001-13

引言

海外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是指近四百年以来国外专业学人或者业余人士对于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文学等领域的考察与探索,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海外学界、智库专家的观察与思考,研究主体主要是各个领域的学科专业人士等;二是海外东方学以及包括于其中的汉学成果,研究主体主要是游历人士、传教士、外交人员以及学院专家等;三是区域研究以及包括于其中的中国学成果,主要是二战以来国外政府与学院的专业知识分子,其成果的呈现主要分为专著、期刊论文以及报刊文献,其中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期刊是发表这些成果的重要平台,也是了解国外思想动态的重要资源。学术期刊作为思想、文化与科学知识的刊发平台,是指引学术研究方向的灯塔,汇聚新的研究成果,产生历史和现实的影响,从而推动新的学术领域的建立。“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①上述讲话对于如何理解以及推动海外中国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既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基于“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的主体性与原创性,那么,“海外中国研究”作为一种“外国的学问”,同样应该放在异域历史语境考察,即何种“主体性”,“原创性”何以可能。“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大环境下,海外中国学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形象,乃至中国国内的发展都有着或隐或显的重要影响。在‘中国研究’的共同论域中发展起来的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尽管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研究上尚未真正确立起中国话语,也未能从根本上对海外中国学产生切实有效的影响。”^②具体体现是,海外学者对中国学者的成果引用甚少,大多数学者基本不关注或者认为不值得重视;大多数人文社科类的中国学术期刊在国际上影响不大;西方学者在国际主流学术圈掌握了阐释中国的话语权。因此,一个亟需解决的文化、外交的战略问题是,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关于本文对海外中国研究期刊这一话题的关注,曹顺庆就中国学界应该如何学术共同体中建设新媒体时代的知识共享平台,提出国内应该集结一批海外汉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对代表性的期刊进行研究^③;张西平认为,在海外汉学的历史中存在汉学文献学的研究领域,汉学文献学是海外汉学研究的基础^④。虽然国内的海外中国研究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但是,总体而言依然存在滞后性、片面性、表层化等问题,部分原因来自学术界对海外中国研究期刊的重视还远远不够^⑤,因此,应该从系统性、持续性、全局性角度解决现存的问题,高度重视海外中国研究期刊作为学术史文献与思想资源的重要价值,对此进行动态性、追踪性、对话性的研究,而不只是功利性地提取对中国历史、社会进行褒扬赞美的论文。应该在学术史的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② 沈桂龙:《让中国学回到中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知识体系及话语权建构》,《人民论坛》2024年第7期。

③ 曹顺庆等:《从“海外汉学”到“中国学”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曹顺庆教授访谈录》,《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④ 张西平:《文献整理是海外汉学研究的基本功》,《国际汉学》2022年第3期。

⑤ 国内学界关于海外中国研究期刊的学术进展,可以参考如下论文:李松、吴冰霞:《视角、主题与方法:海外汉学期刊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李松、杨炜竹:《海外中国学期刊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系统、谱系和脉络中评价域外的观点与范式,只有这样才能补充、丰富、完善中国研究的文献资源,与国际学界开放、平等的深入对话才有可能。一方面,本文所涉及的中国学期刊往往需要与本国以及他国的汉学期刊进行对举比较,从而辨析各自大致的学术范围与时间;另一方面,单独以汉学与中国学指代某种刊物的话,并不符合实际状况。因此,为了表达的便利,本文将东方学、汉学、中国学以及部分亚洲研究刊物统称为“海外中国研究期刊”。其理由是,如果说中国学属于外国的学问,那么,“中国学研究”则是指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学之研究,也就是说,中国学是关于中国的研究,中国学研究是指关于研究之研究。正如以上对于学界关于汉学与中国学概念的理解、使用多有分歧,以中国研究期刊统称东方学、汉学以及中国学与部分亚洲学杂志的话,便于行文表述。本文在全面了解海外中国研究期刊这一学术资源与媒介平台的前提下,基于笔者及团队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方面来论证中国研究的知识体系构建思路与方法^①。

一、海外期刊作为中国研究学科体系的文献根基

学术期刊的创办反映了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学术发展的相对成熟度,其成果标志着科学性、学理性、客观性知识的确立。我认为,建构完善的中国研究的知识体系,需要处理好学科、学术与话语的关系,以学科建设作为抓手,以学术对话作为目的,以中国学批评推动话语建设。下面从总体概况和个案考察两个角度论证海外期刊文献资源对于学科体系建构的重要价值。

1. 期刊文献资源是中国研究的学科体系建构基础

何谓学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的界定,学科是指:“人类的活动产生经验,经验的积累和消化形成认识,认识通过思考、归纳、理解、抽象而上升成为知识,知识在经过运用并得到验证后进一步发展到科学层面上形成知识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和演进的知识体系根据某些共性特征进行划分而成学科。”^②根据这一国家标准,海外中国期刊最直接隶属的学科是新闻传播学,以及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作为信息传播平台,它也广泛涉及人文与社科各种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学科群(discipline group)的集聚,以信息传播属性为核心,同时又包含了若干个其他分支学科。一个学科除了需要具有本质属性或者特性,之所以成立的其他条件是,具有研究对象、人员、机构、团体、目标、方法以及教学单位与出版物。学科(discipline)是指某个发展成熟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一个学科要成为知识体系的话,必须建立在大量基本的文献基础之上,否则即便存在研究对象也没有研究资源,一个学科的空中楼阁无法形成知识体系。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③他尤其强调了新材料之于学术“入流”的首要价值。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④这是著名的“史学就是史料学”观念的来源。可见,广泛地搜集、精细地整理、谨慎地鉴别、严谨地分析史料是从事学术研究十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学术研究的创新,如果首先能在文献上有所突破,那么起码提前取得了资源优势。

① 通常而言,国内学界认为,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属于海外学者探讨中国现当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区域研究领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研究源自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组成部分之一的汉学(Sinology),考察中国古代文化、语言、科学、历史等问题。目前国内外学界大致对中国学与汉学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界定,但是在实际使用中,汉语表述并不完全统一。由于很多汉学期刊与中国学期刊本身是综合性期刊,其发表的论文往往综合性很强,进行泾渭分明的区分并不符合实际,而且还存在跨国、多语种联合办刊的情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https://openstd.samr.gov.cn/bz/gk/gb/newGbInfo?hcno=4C13F521FD6ECB6E5EC026FCD779986E>,2024年4月5日访问。

③ 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

④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1928年10月。

英文汉学期刊经历了 19 世纪“侨居地汉学”时期的初创,到 20 世纪“经院式汉学”时期的专业化和精细化,21 世纪继续走向融合与互动发展,显示出汉学研究的全球化趋势。从“侨居地汉学”期刊到“经院式汉学”期刊,英文的汉学期刊呈现出“本土”和“域外”共存的特点,同时伴随着学术自觉的加强,表现出研究内容精细化、研究方法科学化、研究角度多样化的特点^①。根据我的整理,下面以美国和英国的汉学、中国研究期刊为例,介绍其各自的创办历史过程与主要内容,以呈现期刊文献资源之一角。根据期刊史的历史坐标,美国汉学刊物大致可以分为如下阶段:传教士时期,以《中国丛报》与《教务杂志》为代表;本土化与分化时期,以各学会会刊为典型;当代学科细分化时期,以《中国文学》为代表。不同时期的汉学刊物体现了特定的创刊理念与发展思路。分析代表性的汉学刊物,可以为推进整体的美国汉学史研究提供方向和指南^②。美国汉学期刊创办的第一个高峰以《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为起点,以《教务杂志》(*Missionary Recorder*)为终点。第二个高峰是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以历史类、文学艺术类、哲学类、宗教类刊物为主,数量十分庞大、学科分类更为细密,具有学科分化的趋势^③。美国汉学的综合类期刊主要由美国早期传教士创办,以介绍中国的古代文明和社会文化为主要内容。例如,《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教务杂志》(*Missionary Recorder*,后改名为 *The Chinese Recorder*)等。美国汉学的历史期刊主要创办于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例如,《中国的历史学》(*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中国历史评论》(*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中古中国研究》(*Early Medieval China*)、《唐学报》(*Tang Studies*)、《宋辽金元》(*Journal of Song - Yuan Studies*)、《明史研究》(*Ming Studies*)、《清史公报》(*Late Imperial China*)。美国汉学期刊的文学艺术类,主要创办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例如,《中国演唱文艺》《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简称 CLEAR)等。美国汉学的哲学类代表性期刊有《中国哲学杂志》(*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宗教类期刊主要创办于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主要有《中国宗教研究集刊》(*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中国佛学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Buddhist studies*)等。

美国的中国研究期刊的另一个分支是中国学期刊,其发展受制于中美关系的冷暖亲疏,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冷战前后的曲折发展、中美建交前后的繁荣发展、全球化时代的深化拓展^④。美国中国学是区域国别学的有机组成,受欧洲传统汉学影响,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由美国汉学逐步向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研究转型。欧洲传统汉学侧重于中国历史、语言、哲学、宗教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主要以人文学科为主,社会科学占次要地位。受此影响,在 19 世纪后期起步的美国汉学也注重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研究。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建立起庞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逐渐超越英国并建立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国际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疑对美国在东亚区域的政治、经济等利益构成挑战。经历一段时期的过渡与转型后,美国中国学在保持人文学科特点的同时吸纳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的思维方式、学科范式,创新多样化的分析模式,开拓更大范围的知识领域^⑤。

英国汉学刊物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 19 世纪上半叶的初创阶段,传教士和商人在东方侨居地出于现实需求创办刊物。第二个阶段是 19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初,开始学术化建设。传教士和外交官身份的汉学家创办了更多体现学术兴趣与现实需要的刊物,推动了英国本土和侨居地汉学的长足进步。第三个阶段是二战后的专业化阶段,总的趋势是走向领域细分。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创办发行的英国汉学刊物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体现了特定的办刊理念与价值诉求。选取代表性的英国汉学刊物,考察其创办的历史与现状、影响与意义,可以为推进英国乃至欧洲整体的汉学史研究提供坐标和指南,促进包括传统汉学在内的世界中国学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⑥。英国的中

① 李松、韩彩琼、田璐:《海外英文汉学期刊的创办历史与现状》,《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

② 李松、姚冰欣:《美国汉学刊物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社会科学论坛》2024 年第 1 期。

③ 李松、姚冰欣:《美国汉学刊物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社会科学论坛》2024 年第 1 期。

④ 李松、周雨秋:《以期刊作为方法:美国的中国学学术史变迁》,《文化软实力研究》2024 年第 3 期。

⑤ 以上内容参见:李松、周雨秋:《以期刊作为方法:美国的中国学学术史变迁》,《文化软实力研究》2024 年第 3 期。

⑥ 以上内容参见:李松、杨红云:《文明互鉴:英国汉学刊物的创办与跨文化传播》,《文化软实力研究》2023 年第 6 期。

国学期刊是世界中国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透视英国的中国学演进的媒介平台,其创办始于1960年,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的停滞阶段,21世纪初形成兴盛势头。通过对期刊创办缘起、语境和影响的梳理,可以呈现英国在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及特色。

2. 海外期刊文献价值的个案考察

创办于1843年的《美国东方学会会刊》是美国东方学会的旗舰刊物,也是美国东方学第一本本土的学术刊物,旨在以文献学和考古学的方法考察东方学。美国东方学会凭借学术期刊这一重要平台,组织并汇聚了跨越国家、地区、学科、文化等区隔的学人群体,促进了东方学、汉学以及中国学的学术发展。《会刊》历史悠久、资料丰富、口碑甚佳,其刊载的研究成果涉及宽广的学术领域,所载论文被东方学界与汉学界广泛引用,成为东方学研究重要的学术资源。通过对其1843—2019年间刊载的汉学类论文进行分期整理,可以分为1843—1914、1915—1928、1929—1944、1945—2019四个时期。根据其论文内容的主题进行分类,对华研究重点包括:中国古代历史、语言、儒学、民俗与文学研究等。该刊物研究主题的演变与热点分布反映了欧洲与美国东方学研究旨趣的变化,美国本土汉学和中国学的崛起形成了新的学术方向,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也对研究进程产生了直接的冲击。结合《会刊》的汉学研究状况与西方东方学史以及汉学史的发展进程,可以较为全面地把握该杂志汉学研究的历史分期、演变过程及其原因。据笔者统计,截至2019年,《会刊》合计发行139卷,所载汉学研究论文合计502篇。作为美国东方学研究的代表性刊物,该会刊不仅是管窥欧洲与北美东方学的重要窗口,无疑也是汉学研究不可回避的学术宝库^①。

下面笔者继续介绍《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关于中国范式研究问题的讨论,由此说明期刊所具有的文献价值。《近代中国》作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学术期刊之一,其发展历程与北美中国学的发展潮流密切相关,该刊分五期分别就研究的问题和领域刊载了相应的论文,从1991年持续到1998年,主要包括如下专题:一是“社会经济史上的悖论”(1991(3));二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与理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1993(1));三是“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在中国(1993(2));四是“中国革命再思考”(1995(1));五是“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1998(2))。除此之外,围绕一系列关键问题的七轮“中西方学者对话”论文同时在《近代中国》和国内的《开放时代》发表。

类似上述大量的期刊文献是产生知识的原材料,原材料只有通过研究者的加工、提炼、熔铸才能成为普遍可以理解的术语。“一个学科只有以一系列具有专业性、系统性的概念、范畴、命题揭示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构成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统一体,才能称其为一个成熟的、健全的学科。”^②如何开发、利用海外中国研究期刊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命题。从事世界史、区域与国别、外语类、政治学、经济学等研究方向的少数研究者大量利用第一手的外语期刊文献(可以参见《世界历史》《国外社会科学》《国外理论动态》《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等杂志),除此之外,目前国内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有意识地同步利用海外期刊文献的状况并不多见,他们主要依赖的是相对滞后于学术发展现场的译著与译文,这是笔者呼吁学界高度重视海外期刊研究的原因之一。

二、海外期刊作为中国研究学术体系的对话平台

建立中国研究学术体系需要考察学术史的发展过程、特点与规律,抓住重要的思想、观点,了解其形成、发展的演变史。

1. 海外中国研究期刊推进中西学术互动

学科、学术与话语这三者组成了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结构,相辅相成、逐层递进。“学术体系是揭示本学科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成体系的理论和知识;话语体系是理论和知识的语词表达,是学术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载体。一个学科的学术体系只有通过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表达

^① 以上内容详见李松、黄懿:《〈美国东方学会会刊〉汉学研究的分期及其演变成因》,李雪涛主编:《全球史》(第三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② 田心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与相互关系》,《光明日报》2020年5月15日,第11版。

出来,为人们所知晓和理解。一个学科的话语体系只有准确、充分地表达了本学科的学术体系才是成熟的话语体系。”^①海外中国研究作为一个跨国、跨语言、跨文化的兼容性学科,其学术体系是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前提。话语是一种具有思想倾向性的观念形态,也是一种包含知识真理性认定依据的权力论述。学术体系的建构包括学术机构、研究方法、评价标准以及知识传播平台的构建等问题,成熟的学术体系的构建需要从整体上论证知识体系构建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合理性。

学术研究固然是基于文献进行细致的解读与分析,但不同结论的产生需要研究者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视角、问题意识、诠释方法,需要在历史回溯的基础上,上升到规律性、抽象性的理论反思,从文献中揭示一般的、普遍的意义。如果研究者没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就不容易从人所共见的文献中抽绎出新意,也无法发掘出其中蕴含的思想。杨国荣认为:“学术研究和学术史的回溯需要更为多样的思想资源,从这一方面说,西方学术更非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以此为考察前提,无疑需要避免‘以中释中’等思想趋向。就中西之学的关系而言,对西方学术态度应扬弃狭隘的地方意识,具有宽宏的气度。后者意味着承认:不仅中国学术是思考的资源,而且西方学术同样也是。在构成当代学术思考的理论资源这一点上,中西之学固然各有自身特点,但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二者都是学术发展的资源。由此,中西之学的互动也具有了更广的涵义。”^②学术的历史和理论之间往往在互动与碰撞中激发意义。学术体系的建构需要建立在学术史对话的基础上,中西相互参照才可以从他者视野更好认识自我,而海外期刊是国际学术对话最为直接的通道和媒介。

2. 海外期刊推动中西对话的个案考察

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是美国《中国哲学季刊》的创立者和主编,终生致力于在西方世界介绍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说:“海外中国哲学观念的建立与推广必须归之于英文《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在 1973 年的创立与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Philosophy, ISCP*) 在 1975 年的建立。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以及我较后创办的国际易经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IChing*) 更带动了其他海外中国哲学团体的成立与中国哲学刊物的发行,甚至也带动了国内大型儒家学术组织的成立与发展。”^③从直接目的而言,《中国哲学季刊》的创办是成中英在西方世界推广、传播中国哲学的一个漫长的实践工程。成中英夫子自道:“为什么要说这些呢?主要是说在我创立《中国哲学季刊》之前,我已经对哲学有比较深刻的把握,而且我了解西方哲学他们在做什么。我有一个比较的观念,中国哲学怎么样透过西方的文化来实现自己的发展。1965—1967 年我代表哲学系参加美国哲学学会,参会的有两千多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发表的文章也是西方哲学。我当时很有感触,就是他们认为根本没有‘中国哲学’,等你提了中国哲学,汉学界认为中国哲学就是中国思想,中国思想就是中国思想史。而且除了我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书外,没有第二个中国人在哲学系教过书,所以我特别觉得我有责任把中国哲学提起来,尤其我不太喜欢‘中国没有哲学,中国只有思想’这样的提法,我说中国有的不只是思想,还有一种活的思维,而不是已经陈旧的思想痕迹。所以我从那时候起就决定要创办《中国哲学季刊》。”^④了解上述历史语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哲学或者汉语哲学在美国学界处于被忽视的盲区,为中国哲学正名或者说让西方学界理解中国哲学的思想及其学科正当性,让世界哲学殿堂留出中国哲学的位置,这是一条筚路蓝缕的拓荒之路。

起步伊始,成中英确定了创办这个期刊的目标使命,以及所需要的资源整合,即人力与财力。《中国哲学季刊》起始阶段以《中国哲学通讯》刊行,但是除了他自己,没有编辑,国外学术圈也没有真正从事中国哲学的同道,有的学者只是从汉学的角度理解中国文化、历史、宗教、美学与思想。于是成中英只好将刊物寄到有哲学系、有中国人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光有中国人还不够,我还想要把西方人纳入到

① 田心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与相互关系》,《光明日报》2020 年 5 月 15 日,第 11 版。

② 华东师范大学文明互鉴研究中心:《汉学过时了吗?——巴黎“汉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座谈会”述要》,《国际儒学》(中英文)2023 年第 2 期。

③ 成中英:《中国哲学三十年》,《光明日报》2010 年 8 月 16 日,第 12 版。

④ 成中英:《〈中国哲学季刊〉创办历程及关于中国哲学发展的思考》,《船山学刊》2017 年第 6 期。

这里面,怎么纳入呢?就是要训练西方人,教育西方人。”^①哈佛大学史华慈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他认为成中英所说——“中国哲学最大一个特点,不是把思想划定在某一个方面,而是把它展现成为一个整体”——很有道理。成中英吸收他作为编辑委员,并为刊物撰文。

为了《中国哲学季刊》顺利出版,成中英提前进行了长期的组织准备。他1971年开始筹备建立编辑委员会,这些成员的合作是成中英向西方学者介绍、传播中国哲学的结果。此外,他试图建立一个中国哲学研究的学术群体,从1965年开设中国哲学讨论课,其内容包括《易经》、道家哲学、宋明理学、隋唐禅学、近代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通过这些课程培养了研究者和爱好者。“我对中国哲学有一个深入了解之后,就把西方一些具有思想高度的汉学者或者思想研究者资源聚集到一起。”^②这个杂志得到了李约瑟的支持,他也成为了作者。“就这样,慢慢地我把整个西方对中国关心、具有思想能力,并且能够真正去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些人才资源整合起来,成了早期的编辑委员会。这其中包括一些老前辈的研究者,也包括一些新的,可能对中国哲学不是很了解的哲学家,但他的工作是怎么了解这个概念,怎么分析,怎么掌握它的义理。这批人也是非常好的,包括我在美国的导师也被影响了。这一批人主要分布在美国的一些重点大学,包括哈佛大学。”^③成中英利用开会的学术交流机会广交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向他们讲解中国哲学的基本导向,立足文化典籍使其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理念,中国人对于知识和价值的界定,中国人的宇宙观及其变化视角等。1975年成中英等人创办了国际中国哲学学会,陈荣捷、方东美、安乐哲等学者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中国哲学季刊》得到了国际学界更多的关注。1975年到1985年十年期间,包括庞朴、方克立等在内的中国大陆学者加入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他们邀请成中英回国交流讲学。借助国际中国哲学会议的广泛影响,国内外逐渐形成了中国哲学的研究潮流,每次会议都有大量论文交流讨论。除此以外,成中英穿梭于各种哲学会议包括中国哲学以及亚洲哲学的研讨活动,通过以文会友带动很多西方学者参与中国哲学的建构,保证了《中国哲学季刊》充足的稿源。“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绝不只是在传播中国文化,绝不是单纯的传播。我是在重建中国哲学的一种陈述,重建中国哲学的一种精神。而这个重建精神,回归到中国来说的话,有它的重要性。认识了中国人内在的精神,同时也可以反过来促使中国人走向更清楚的、更细致的哲学思考。总结来说,一是通过各种以文会友的方式,以学会友的方式,凝聚更多对中国哲学有兴趣、实际投入到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④《中国哲学季刊》并不发表过于贴近现实问题的文章,成中英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刊物的文章应该是纯粹的学术与哲学主题,很多宣传式文章一概不要,力图培植一个中国哲学的精神独立的思想共同体,通过学人思想血脉维护中国哲学的传统。“这样的话,中国人的智慧才会以一个更高的形式来呈现,或是加以持续的发展。”^⑤成中英通过《中国哲学季刊》架设了一座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桥梁,拿到了通向西方哲学的入场券。“我在哲学探索中采取的办法是知己知彼,知彼知己。我要知道我自己,我又要了解对方,也就是了解西方,了解这个世界。我要相互地明白,相互地通融,这样就会齐头并进,把中国人的精神和智慧带到现代。”^⑥他认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关键在于通过哲学。他以《中国哲学季刊》作为媒介,开辟了面向西方学术界的自我表达之路,即“主动表达人性,表达人的理想,人的意志,人的希望,或者信念的存在”。成中英认为在这个刊物诞生之前,这种哲学的认识在以前是没有的,他将其激活起来,克服了通讯工具不便、资金窘困的困难。更难的是没有学术团体来教中国哲学。“那个时候没有条件,而且大家也不认同中国哲学,认为中国只有汉学,亚洲研究,中国研究,所以我办了那样一份英文杂志,开始就拿出一个身份出来,在这个身份之下说服大家来组建一个哲学社团,这是

① 成中英:《〈中国哲学季刊〉创办历程及关于中国哲学发展的思考》,《船山学刊》2017年第6期。

② 成中英:《〈中国哲学季刊〉创办历程及关于中国哲学发展的思考》,《船山学刊》2017年第6期。

③ 成中英:《〈中国哲学季刊〉创办历程及关于中国哲学发展的思考》,《船山学刊》2017年第6期。

④ 成中英:《〈中国哲学季刊〉创办历程及关于中国哲学发展的思考》,《船山学刊》2017年第6期。

⑤ 成中英:《〈中国哲学季刊〉创办历程及关于中国哲学发展的思考》,《船山学刊》2017年第6期。

⑥ 柳理、关静整理:《国学耆宿成中英自述学术路 盼中国哲学走出去》,凤凰网, <https://news.ifeng.com/c/8NkHSpHB2Pk>, 2024年4月1日访问。

当时的情况。”^①《中国哲学季刊》创办以及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的创立,标志着中国人在海外建立了哲学主体,意味着一种表述自己的主体精神的觉醒,这个过程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历经 Dialogue、Blackwell、Wiley - Blackwell 和 Brill 等出版社,得到了国际学界的高度认可。成中英回答了“我们的文化怎么走出去”的问题。“首先要对自身相信什么,知道什么,能够做什么,实践什么,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个清楚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对他人的认知上面,这是一个循环,自始自终来了解自我,了解他方,最后通过文字,建立起可以固定的形象。”^②通过以上期刊个案的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学者应该重建基于历史、文化、思想的基本学术体系,然后去思考中西认同的现实问题、翻译沟通的理解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生问题。没有这个内在建构的思想基础和文化自信,中国文化难以真正走出去并且扎根、开花、结果。

三、海外期刊作为中国研究话语体系的阐释资源

话语体系不仅仅包含语言、概念、知识与思想,也包含信仰、权力与认同。其建构的前提是,不仅要明确何谓话语,而且还要追问谁的话语、如何论述、谁有权论述等问题。“学术体系是揭示本学科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成体系的理论和知识;话语体系是理论和知识的语词表达,是学术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载体。一个学科的学术体系只有通过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表达出来,为人们所知晓和理解。”^③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密不可分,二者既有统一性也有差异性,其形成、发展并非完全同步。具体体现的情形是,第一,同一学科体系内部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在一个学科体系中,还会出现同一概念用不同的语词来表达,同一语词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同一术语在思想、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发生含义上的变化等情形。这就使得一个学科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构建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工作。”^④第二,同一学科内部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差异性。“在同一学科领域不同体系、不同学派之间,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关系呈现出复杂情形。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由于立场、利益、认识等方面的差异,在同一学科领域会形成不同乃至对立的观点,既表现在学术体系中,也表现在话语体系中,二者交织并存。一些看上去相同的术语,在不同体系和学派中可能含义既有关联又有重大差别。”^⑤因此,学术体系建构完毕,并不意味着话语体系就自然而然大功告成。当代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与中国声音的世界表达,尤其需要重视话语转化能力的建设。

中西学术对话经历了一个历史渐进的曲折过程,了解这一过程有利于克服盲目自大和妄自菲薄。吴原元以百年来中国学人的域外汉学批评为对象,揭示了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的批评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的这项研究成果反映了学术话语的流动性特点。他认为,清末民初之际,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并不以为然,甚或有尖锐的批评,即使对域外汉学所擅长的“半汉”之学有所褒奖,亦非盲目推崇,实基于对自身学术的自信;1920年代后,中国学人在通过取法域外汉学欲与之抗衡的同时,也通过纠谬捍卫自身的学术尊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学界在追踪域外汉学动态及选译域外汉学论著之同时,主要是基于价值主体性对域外汉学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方法论及其史料展开批判;20世纪80年代后,西潮再一次袭来,中国学界对域外汉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过于迷信、盲从,放弃了学术应有的主体性和批判性^⑥。基于以上海外中国研究话语流变的梳理,可以看出,一方面,国运兴衰对于学人信心具有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海外中国研究知识体系的建构最终要落实到话语体系。话语体系的形成需要经由一种具有鲜明反思性批判的中国研究来实现。笔者认为,有两

① 成中英:《跳出汉学时代轨迹建立新哲学的自我认同》,中国孔子网, http://www.chinakongzi.org/dajiatan/201808/t20180822_181479.htm, 2024年4月1日访问。

② 成中英:《跳出汉学时代轨迹建立新哲学的自我认同》,中国孔子网, http://www.chinakongzi.org/dajiatan/201808/t20180822_181479.htm, 2024年4月1日访问。

③ 田心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与相互关系》,《光明日报》2020年5月15日,第11版。

④ 田心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与相互关系》,《光明日报》2020年5月15日,第11版。

⑤ 田心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与相互关系》,《光明日报》2020年5月15日,第11版。

⑥ 吴原元:《百年来中国学人的域外汉学批评及其启示》,《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

种阐释谬误是可以直接判别的。第一,意识形态阐释。“哲学社会科学中不同思想理论体系之间的对立,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既表现为思想、理论内容上的矛盾,也表现为话语体系的对立和话语权的争夺。”^①基于利益、信仰、立场等因素的思想分歧永远不会停息,知识的形成暗含权力博弈的过程。第二,知识错误的阐释。这种由于常识错误导致的啼笑皆非是容易辨别的,属于明显的客观知识问题。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对待错误的根源,不仅指出哪里错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探讨产生错误的成因与机制。除此之外,还有三种不同的海外中国研究阐释目的的类型,下文结合一些研究案例进行说明。

1. 以互补为目的

中西思想之间存在一个作为中介的地带领域,它就是“中国研究”。中外学者都是通过不同角度考察同一个中国这一客观对象,形成更为深刻的自我认识和更为全面的世界想象。“中国研究”是提供双方认识的双面镜和参照系,圆融之观需要各自改换位置和视野,从镜中所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而是一个对话与比较而形成的新的自己,从而旧我和新我、自我和他者形成视域的互补。

美国权威的汉学研究期刊《中国文学》自1979年创刊以来曾发表多篇明清小说女性形象研究的论文,性别诗学是其中的重要命题,体现为他者审视中的性别形象、失语的女性群体、文化层面的性别差异三个研究路向。海外汉学的性别研究在思路与方法方面无疑受到西方主流理论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批评实践。一方面,理论的优先性很可能对文本解读形成某种潜在影响,或者会被批评有文本嫁接理论之嫌。另一方面,需要正视的事实是,海外汉学的性别研究成果具有与西方理论对话的意义。一般人总以为西方的文化理论可以为中国文学研究带来崭新的视角,却很少有人想过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也能为西方的批评界带来新的展望。所以,汉学性别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重构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也可以帮助西方学者丰富和重建文学、历史与性别研究理论^②。

海外中国研究作为一个跨国、跨地区、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综合领域,涉及不同范畴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应该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对不同文明形态进行分析,借鉴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标准,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③我们应该基于历史实际,坚持辩证、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检验、发展真理。

2. 以对话为目的

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创办了美国著名学术期刊《近代中国》,这是权威的区域国别研究刊物,从1975年创刊至2022年已经出版48卷,刊载了约800篇文章,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近代中国》自创刊肇始,创办者就具有明确的办刊理念,即为中国学研究提供一个论坛与平台来审视过去的成果,并提出新的问题、拓展新的领域。近些年来,办刊方向的一个新的亮点是朝着中国研究的“跨国”(transnational)大方向和理念推进。除主编、副主编以外的29位编委会成员中,刊物的编委已经从之前没有大陆的学者发展到今天六位学者名列其中,其中包括黄宗智自己从中国带出来的两位学生(高原和赖骏楠)。大陆学者的来稿和用稿占比也越来越高,这是正在呈现的新趋势。随着黄宗智与中国学界联系日益增多,中国学者在《近代中国》发表的论文也不断增长,使其有机会掌握国际学术话语规则并且在英语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近代中国》作为学术对话的平台,中西学界的交流在此汇聚,相比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他者叙述,该刊物的中国研究在选题、观念与方法上日益贴近中国语境本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宗智曾主导了多次针对不同研究问题的学术讨论,其成果大多发表在《近代中国》特刊,同时也被翻译成汉语刊发在国内学术期刊,从而使其议题在汉语学术圈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与接受,促进了中国学界在世界前沿问题的对话^④。

① 田心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与相互关系》,《光明日报》2020年5月15日,第11版。

② 以上内容参见:李松、岳炯彤:美国《中国文学》杂志的明清小说性别诗学研究,《汉语言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④ Ping Liu, Song Li, Jiaman Tang, “Reflections on the Ideas, Paradigms, and Methodologies of China Studies: Philip C. C. Huang and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49(3), 2023.

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的“当代世界的中国美学”特刊刊发的六篇论文包括《中国哲学季刊》主编成中英的《前言:中国哲学中的美与美学》、韩国学者朴素晶的《导言:当代世界的中国美学》以及来自其他学者的四篇论文。这些论文试图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将中国古典美学置于当代世界这一时代与学术语境下,围绕中国古典美学的某一个具体问题展开研究,寻求平等的比较与对话,使沉淀于遥远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古典美学理论重新复活于思想空前活跃的当代世界文化平台。通过对特刊论文的梳理,可以看出各位学者多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重视在比较中突出中西美学思想的对话与交流;而通过当代学术话语与问题对中国美学的阐述与审视,中国美学对西方美学固有的传统框架产生了一定的冲击^①。研究中国问题要谨防陷入偏狭的后殖民主义漩涡。“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②每一种理论、思想都具有一定的地域、民族、时代特色,但是,同时也不可否认不同的文明之间也有共享的、对话的价值理念。

应从全世界、全人类这个框架来思考中西思想观念基于地域、民族、传统而具有的特殊性,以及基于人性、伦理、常识而具有的共通性。杨国荣认为:“今天从事学术思考,应当站在世界学术的高度来反观不同传统,在世界学术的视野之下,无论中国学术抑或西方学术,都是今天进行学术探索的必要资源。站在世界学术来看待中西学术之间的关系,则两者便不是一种简单的排斥关系,相反,西方学术构成了进一步思考中国学术的重要参考背景。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西方文化包含丰富的思想资源,认真地理解、吸取、消化这些资源,是提升前述学术理论素养的途径之一。”^③杨国荣尤其强调今天中国学者应该站在“世界学术的高度”“在世界学术的视野”来开展中西文明互鉴。中西学术互动最为直接的对话平台是学术杂志,它提供了一个即时性、动态性、引领性的话语场域。

3. 以互鉴为目的

海外中国研究的成果对于近代中国学术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法国探险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的西域、敦煌研究,瑞典学者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的中国语言学研究,法国汉学家沙畹(Édouard - Emmanuel Chavannes)的中国史研究。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词中说:“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涂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④对于海外学者的观点,无批判地全盘接受与绝对否定都有问题、陷入偏执。“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⑤将某个国家或地区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的观点硬套到所有国家和民族,无视历史实际情形会产生荒谬的结果。傅斯年对伯希和的汉学成果评价很高:“本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藉,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

① 以上内容参见:李松、祝越:《中国古典美学与当代世界的对话:以美国〈中国哲学季刊〉特刊为中心》,《社会科学论坛》2023年第2期。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③ 华东师范大学文明互鉴研究中心:《汉学过时了吗?——巴黎“汉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座谈会”述要》,《国际儒学》(中英文)2023年第2期。

④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词》,《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1号,第1页。

⑤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①伯希和对中国文献的掌握曾经在欧美汉学界独擅胜场。傅斯年主张中国学界应该学习外国对于汉学的优长。“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胜,各学皆然,汉学亦未能除外。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存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镜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自广也。二十年来日本之东方学进步,大体为师巴黎学派之故。吾国人似不应取抹杀之态度,自添障碍以落人后。”^②海外中国研究意味着中国学术的世界性与现代性,离开“世界中的中国”无法理解“世界中的中国学术”。海外中国研究历经400年的学术积累,队伍不断壮大,水平不断提高,学科体系不断健全。虽然历经曲折与起伏,但是总体而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我们需要深入考察目前中外思想传播中的深层次问题以及重大挑战。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应该体现在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性与发展。我国当前的基本思路是,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因为海外中国研究属于这里所讲的“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深入把握海外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观点与思想、方法与路径,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体系具有基础性价值。

根据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区域国别学(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已经成为交叉学科之下的一级学科。“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尚未得到独立学科的支撑,缺乏系统的学术机制和人才培养方案。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尚未能充分发挥其服务国家、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作用,因此有极大的发展空间。”^③国内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强区域国别研究、科研教学体系的构建、人才培养工作的深化,是区域国别一级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④这段话讲的是如何理解当代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如果反过来思考国外学术的发展,那么,我们得到的启发是,考察海外中国研究同样也需要跨越中西学科,具备贯通古今的历史视野,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应该将世界的中国研究与本土的中国学研究结合起来,在世界与中国的大历史中进行文明交流与互鉴。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媒体平台、影视生产、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图像视觉文化成为当代主流的强势传播内容,图像时代已经成为既成的社会现实。与这些社会现象相关的研究成果,例如图像传播理论、符号理论、视觉文化等学术话题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重视。其中关于“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尤其热度与争议性。作为两种不同的表达媒介,文学与图像孰先孰后、孰优孰劣、是同是异、是分是合?近年来,围绕“文—图关系”展开的各种错综复杂、各执一词的学术议题纷纷涌现,成为国内外不少学者热切钻研的前沿话题。2014年《中国文学与文化》(*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由北京大学袁行霈与美国伊利诺伊香槟分校的蔡宗齐共同创办,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刊行。该刊物主要以中国古代文学为研究对象,致力于中国、美国及全球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2017年被A&HCI正式收录,成为西方学界继《中国文学》之后新近崛起的专业期刊。2015年4月袁行霈和商伟合作编撰了“中国文学与视觉文化”(*Literature and Visual Culture of Early Modern China 1550—1911*)特刊(第2卷第1期),集中讨论早期现代中国(1550—1911)文学与图像的关系。这个专栏收录了六位学者的论文,分别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袁行霈、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商伟(Shang Wei)、密西根大学艺术史系刘礼红(LiHong Liu)、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艺术史系李慧漱(HuiShu Lee)、伊利诺伊香槟分校美术与应用艺术学院安濮(Anne Burkus Chasson)以及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区艺术与建筑史系石慢(Peter C. Sturman),

① 转引自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② 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转引自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③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https://www.acge.org.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 2024年4月1日访问。

④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他们各自从具体的个案批评切入,探讨了中国明清时期文学与图像复杂的互动关系。《中国文学与文化》特刊文图研究的学术特点可以概括为:从关注“文图互仿”到重视“文图互动”的转向,即不再局限于文图互为对象的阐释单一性,也不再拘泥于文图相互摹仿这一僵化的转换标准,而将目光放诸更大的文图整体,探究文图之间更为复杂的艺术互动形式、文图背后更为宏阔的社会背景,从而提供更加独特、多元的学术阐释。通观《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以上论文,虽然商伟在序言中对袁行需文章观点的摘取与总结加强了袁行需的文章与其他文章的联系,但二者在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着不小的裂隙。这样一种“中西合璧”的内容呈现不是缝补,而是相互展示与相互学习。商伟指出:“我们发现,在孤立的、一对一的关系中讨论文字与图像的关系是无效的。我们努力揭示的,是图像与文字在特定语境下的作用,这告诉我们它们在语言和视觉层面的运作。”^①这可以看作是对这期特刊论文学学术特色的总结。他们认为,对于文学与图像的研究应以二者的媒介异质性为前提,在文图互动关系中文学与图像不是彼此替代,而是彼此互为语境,从而以各自的媒介特质为艺术整体创造意义。同时,他们也强调,要更加关注与重视文图共存背后的文化与历史语境,通过语境为文图关系提供更大的阐释域,凸显文图互动意义生产的能动性。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学者对于文图关系确实有不同的思考,在研究中也呈现出了一定的新意与亮点,有的观点甚至带有“反叛”的意味,但对既定传统的挑战也同样会带来“风险”——文图同质性与文图异质性、文图互仿与文图独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都是天平的两端,因反驳一方而坐实另一方势必导致天平的再度倾斜,造成研究的偏颇。因此,与其不加消化地全盘接受西方学者的观点,不如对中西观念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贯通与结合。《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这一特刊集中体现了海内外学者关于中国明清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的学术观点与学术特色,反映了海内外文图研究的最新进展。这个视野开阔的学术窗口为国际学界展现了别致的学术风景。在国内外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蓬勃发展、文图研究学术水平不断提升、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当代语境,这种探究与对话是十分必要、大有裨益的^②。

世界中国学包含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是文明互鉴之学,应该坚持兼容并包、开放包容。郑永年说:“中美冷战局面下西方对中国的关切是否会促成西方社会科学的转型和复兴?这种转型和复兴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到西方的中国研究?日益渐增的外在压力是否会转变成为中国学者的动力来建设中国本身的中国学?”^③我认为,既然中国学特指国外关于中国的总体研究,那么,他提出“中国本身的中国学”这一说法,显然在语义上、表达上都自相矛盾。我们可以通过反思批判国外的中国学,从而与我们关于国内问题的研究形成对话与互鉴,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国的涉外研究即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沈桂龙说:“‘让中国学回到中国’,并非让国外研究中国的学问变成中国知识界自身研究中国的学问,而是期待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通过知识体系及话语权建构,在海外中国学的发展上发挥更加积极、更为有效的引领作用。”^④“让中国学回到中国”的“回到”,是就学术研究的话语权或者科研成果的质量与数量而言,中国掌握“中国学”的主导地位是一个值得努力的雄心勃勃的宏大愿景。国内的中国研究可以对国外中国学产生一定的影响,形成增进共识的建设性对话,但是绝不可能取代对方学科建制的存在,作为一种旁观者清的他者视角的优越性更不可替代。即使有朝一日中国学界掌握了关于阐释中国的主导权,也不可忽视一种他异性视角的批判性价值。寻求一种理性的他者批评并且虚心聆听、随时纠错,这是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的体现。

① Shang Wei,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1), 2015.

② 以上内容参见李松、陈文欣:《从文图互仿到互动——论〈中国文学与文化〉杂志的明清视觉文化研究》,《艺术学界》2023年第1期。

③ 郑永年:《在西方,中国研究濒临死亡》,微信公众号“大湾区评论”,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4MTUyNDI4Ng==&mid=2247486684&idx=1&sn=3a555af6ca9176f1636d7a5b5ede680d&chksm=cf65e78df8126e9b577c350cc39ff71e4de2ef7025f760d8ad5ae1874107e0edee4a3e1dc9799&scene=27, 2024年4月1日访问。

④ 沈桂龙:《让中国学回到中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知识体系及话语权建构》,《人民论坛》2024年第7期。

结语

海外中国研究期刊是宝贵的文献资源、动态的学术平台,也是中国文化自我认知的一面镜子。葛兆光以历史文献作为基础,以“中国的自我认识”为中心,把以往的中国历史分成三个阶段。这对我们如何认识中西文明交往的历史流变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第一个阶段称作“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对于周边的鄙视和傲慢)和以自我为宗主的“朝贡体制”。第二个阶段即“一面镜子的时代”。在西方这个“他者”的映照下,中国人才开始了对中国的重新认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看似普遍同质的时代,我们恰恰有可能进入第三个时代,即“在多面镜中认识自我的时代”。从周边看中国,重新确立他者与自我,换句话说就是,从周边各个区域对中国的认识中,可能我们会重新认知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①。以海外中国期刊作为对话平台,可以发现上述线索所提供的参照意义。为了适应全球化时代学术思想市场的竞争与挑战,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国际竞争力,我们应该“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②。学科体系是人才培养、知识生产的建制性前提,学术体系是研究谱系建构的结构工程,话语体系是标识性概念、范畴、命题建构的标志。本文的立意是,立足国际学术前沿建立海外中国研究的知识体系,形成“世界的中国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世界为观照,以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为观照,立足世界知识、文化、思想交流与互动的实际情形,解决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共同的问题,打破思想壁垒,融通相互理解,从而不断推动世界各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总之,海外中国研究知识体系的构建立足于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批判性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理论与方法,梳理历史与现实的延续关系,在关怀全人类命运的高度建构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努力搭建自由、开放、平等、尊重的哲学社会科学对话平台,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贡献中国力量与中国智慧。

(责任编辑、校对:臧莉娟)

Discipline, Academic and Discourse: Overseas Journals and Knowledge System Construction in China Studies

LI Song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In the past four hundred years, nearly 200 journals and magazines of orientalism, sinology and China studies founded overseas constitute important academic resources for China studies. Domestic Chinese 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y scholars should combine 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 with local China studies, and conduct civilization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in this great histor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Civilization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re carried out in this great historical process. Overseas China studies imply a cosmopolitan nature and modernity for Chinese academics. “Chinese academics of the world” would not be well understood without “China of the worl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both historical and current situations, viewpoints and ideas, methods and paths of overseas China studies is of fundamental value in constructing a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 ideolog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premise of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academic resources and media platforms of overseas China study journal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to construct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 studies from three aspects: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Key words: overseas China study journals; knowledge system constructio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cademic construction;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① 葛兆光:《预流、立场与方法——追寻文史研究的新视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